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華民國與東歐國家關係之回顧和展望

doi:10.30390/ISC.199110_30(10).0010

問題與研究, 30(10), 1991

Wenti Yu Yanjiu, 30(10), 1991

作者/Author：洪茂雄

頁數/Page：111-12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1/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110_30\(10\).0010](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110_30(10).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華民國與東歐國家關係之回顧和展望

洪 茂 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一、前 言

我國政府自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宣佈開放東歐市場迄今，已有十二個年頭。在過去這一段歲月裏，無論國內或國際情勢，都有劃時代的轉變。例如，在國內方面，宣佈解嚴，開放報禁和黨禁（一九八七年七月）；允許人民赴中國大陸探親（十一月），台海兩岸冰凍達四十年的對抗關係趨向緩和，雙邊互動逐漸頻繁等等。國內政治環境正大步邁向民主化，以及海峽兩岸由長久的敵對態勢明顯地朝向正常化，這種新發展都是歷史性和令人鼓舞的轉折。至於在國際方面，東歐國家的全面「非共化」（一九八九至九〇年）；柏林圍牆的倒塌，東西德出乎意外快速統一（一九九〇年十月）；東西方冷戰的落幕，以及蘇聯人民紛紛站起來革了共產黨的命，敲響世界共產黨「母黨」的喪鐘（一九九一年八月）等等。凡此空前劃時代的變局，都令人目瞪口呆，使人感覺到，這個世界正在展現新面貌，戰後建立的秩序結構又在蛻變之中，醞釀一個國際新秩序的來臨。

正當國人面臨此種國內外局勢巨變之際，不免有諸多問題發人深省。舉凡如何因應當前共黨世界的分崩離析？如何看待蘇聯和東歐「非共化」後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空間？東西方對抗四十年的冷戰結束後，我國應如何積極參與國際新秩序的來臨？蘇聯這個「社會主義祖國」的解體能對中共帶來何種程度的衝擊？若是中共也步上蘇共的後塵宣告崩潰，那麼國人應如何嚴肅地迎接這種變局的來到？以上種種，都是很值得國人認真思考，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主旨重點擺在東歐國家，試就該地區「非共化」前後，與我國發展雙邊關係之過程，略作回顧，並對未來的前景提出某些觀察與分析，以供關心此一問題者參考。

二、我國與東歐國家發展關係之背景

因為大多數國家僅擁有有限的資源、資金和科技，致使現代政府的基本目標——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很難獨立完成。所謂「相互依存」，即指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過程，必須相互合作，方能滿足彼此間的需要或期望。所以，對外貿易乃是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①我國是屬海島型經濟，天然資源缺乏，國內市場狹小，故以貿易為穩定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目前，我國的對外貿易佔國民生產總值有五分之四之多，可見，政府透過國際行動發展對外經貿關係，是當前我國至為重要的國家目標。惟現階段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加上台幣對美元匯值節節升高，對我國商品的出口構成嚴重的威脅。為了因應這種新情勢，當前我國的貿易政策不外乎採取下列措施：

(一)經濟國際化，鼓勵大企業在國外設廠，利用該地區的配額和商標，以突破廠商擴張的瓶頸。

(二)貿易自由化，分散海外市場，便利廠商尋求有利的銷售對象，而不致受到某些國家或特定一、二企業的干預，以減少對其依存度。

(三)工業升級，使產品高級化，可減低外銷實績的衝擊，因為外銷產品高級化，能減少中、下品質產品的競爭而打入國際市場。

(四)加強品質管制，實施出口監視制度，密切注意各國政府對我國政府設限的動機。

(五)業者與政府密切配合，有助於國外課徵傾銷關稅沖銷。

其中拓展東歐市場，是我國外貿政策重點之一。長久以來，由於政府堅持反共政策，共黨國家被列為禁區，關閉所有來自共產世界的資訊，因此，對東歐國家可謂一無所知。很明顯地，過去政府因受意識形態的束縛，眼中的世界好像只有美、日和西歐，以及少數第三世界反共國家。所以，我國早期的對外關係只偏於一隅，坐失可觀的經濟利益。七十年代以後，我國的經濟快步起飛，外貿成長直線上升，貿易順差逐年增加，國民平均所得也大幅增長，直逼已開發國家之林。但反觀我國的貿易結構和貿易伙伴，都有「二頭熱」——即對美、日兩國的貿易依賴擴大，幾乎佔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三分之二。政府有鑑於這種貿易過份依賴的程度，加上有識之士從中的呼籲，政府乃決定分散市場，拓展美、日以外地區的貿易。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宣佈開放東歐市場。具體言之，促進我國與東歐國家的經貿關係，大致可歸納下列幾點因素：

第一，分散市場的必要性：我國對美國和日本貿易過分集中，容易造成依賴。因此，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政府為了有效分散市場，乃積極研擬新的貿易策略，俾有效擴大貿易領域。東歐地區擁有一億四千萬左右人口（包括東德在內），其貿易結構與我國甚具互補作用，市場潛力可觀，值得開發。對東歐本着「政經分離」與平等互惠原則，放寬貿易限制，而逐漸改

① 郝思迪著，龔文周、何建台譯，國際政治解析的架構，台北：龍田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頁一四一。

進雙邊貿易關係極為可行。

第二、民間企業的壓力：東歐國家的工業基礎已達相當水平，其化工原料或半成品對我國廠商頗具吸引力，再加上東歐地區民生消費物質短缺，正是我國中小企業出口商品的主要項目，若能開發這塊處女地，均符合雙邊經濟利益。為此，我國企業界基於有利可圖，自然樂於開發東歐市場。六十年代末期以後，我國已有少數廠商透過第三國，暗中與東歐國家進行間接貿易。

第三、輿論界和學術界的支持：輿論的力量已能够產生對政府監督的功能，尤其學術界客觀的研究分析，也多少能影響政府的相關決策。過去，政府的對外政策深受意識形態的牽制，等於限制了我國的對外活動空間。這種自我設限，導致我國在國際社會愈形孤立。一九七五年以後，學術界和輿論界有鑑於這種落伍理念乃提出批評，要求政府修改其保守的政策。一九八八年民間廠商組團赴蘇聯考察，曾一度遭到執政黨保守派質疑，並以蘇俄在中國一書之內容為由加以指責，但因獲得輿論支持，始得順利成行。同時，我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貿關係也更進一步放寬了限制，即為明證。^②

三、我國與東歐國家關係之進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東歐淪入鐵幕，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等八國，均先後建立共黨政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國政府被迫播遷來台，於是這些東歐國家立即承認北平政權。由於我國政府長期執行「反共政策」，標榜「漢賊不兩立」。因此，與所謂「共黨國家」自然壁壘分明互不來往。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政府宣佈開放東歐市場之後，我國與東歐國家長期的冰凍關係，始有重大突破。職此之故，一九七九年可視為我國發展與東歐國家關係的分水嶺。為了敘述方便，作者探討我國與東歐國家之關係，基於雙邊關係發展的進程所呈現的特徵，以及國內外環境變化等因素，特別區分下列階段以爲說明。

我國與東歐國家關係之發展，把一九七九年視為一個分水嶺的話，則一九七九年以前可稱為前期，一九七九年以後稱為後期。因後期的進展有明顯差異，故再把後期區分為三個階段，即市場開發階段、成長平穩階段以及擴大交流階段。茲扼要概述如後：

② 自立早報，民國七十七年十月三日，第二版。

前期：雖然政府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才宣佈開放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東歐五國的市場，但事實上，我國廠商與東歐國家進行間接貿易早有軌跡可循。因此，這一時期我國與東歐國家之關係，基本上可從六十年代後期看出一些端倪。如透過瑞士或西德廠商向捷克、東德、匈牙利等東歐國家進口紡織、機器和化工原料；一九六五年在行政院屬下成立「對匪經濟作戰委員會」，由經濟部、中央信託局、安全局和調查局等相關單位負責人組成。其設立的目的，主要是對中共經濟作戰，並兼顧蘇聯、東歐國家的貿易政策。這個組織在七十年代改名為「力行小組」，由一位政務委員負責召集。③原則上，我國對東歐的經貿政策是由經濟部國貿局擬訂，然後再送請行政院「力行小組」審議作最後決定。此時期政府之所以特別關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貿動向，並在某種範圍內容許民間廠商與東歐國家進行間接貿易，其主要理由是：其一，中蘇共進行意識形態鬥爭，隨後發生邊界流血衝突，雙方關係惡化，東歐國家（除了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之外）因站在莫斯科這一邊，彼此關係也呈現低潮。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與蘇聯和東歐國家彼此都有降低敵對態勢的意願，在某些外交公開場合心照不宣，開始有所接觸。一九六八年，名義上為英國倫敦晚報派駐莫斯科採訪的蘇聯籍記者路易士（Victor Louis）首次獲得我國簽證允許入境，並得與當時擔任國防部部長的蔣經國先生長談四小時。④這多少反映了我國的反共「抗俄」政策已有所鬆動，不像五十年代那麼堅持。其二，中共搞「文化大革命」，教唆紅衛兵造反，蘇聯和東歐國家外交使館人員均遭騷擾或蒙受其辱，導致中共在外交上愈形孤立。六十年代後期，海峽兩岸這樣的懸殊發展，我國自然較容易為東歐國家所接受。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作者持中華民國護照，曾先後三度赴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旅遊，簽證均未遭刁難，正可說明東歐國家對我國的敵意已在化解之中。總括的說，我國與東歐國家發展關係的前期，民間企業暗中自行摸索，透過第三國以間接方式主導與東歐的貿易活動，政府決策過程則仍受意識形態的約束，僅能小心翼翼的觀察，未採取具體的措施。

後期：從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政府宣佈開放東歐市場至一九九一年，歷經將近十二年之間，我國與東歐國家關係之進展有相當明顯的變化，不難勾劃出發展過程的某些特徵。為能掌握此一時期的特色，特劃分三個階段陳述如下：

（一）市場開發階段（一九七九—一九八五年）：這一階段顯然是着重在東歐市場的認識與開發，以及擬訂具體可行的經貿政策等工作上。其主要作為可歸納如下數點：

1. 在研究方面：行政院研考會、經濟部國貿局和世華銀行等單位，於一九八二—八五年間曾委託過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台灣經濟研究院及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等學術機構進行專案研究。這些研究報告無疑地提供給國人和政府決策單位相當

③ 新新聞週刊，台北：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七日，頁三〇。

④ 小世界週刊（台北），第二一五期，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八日，第一版。

寶貴的參考資料，作者在一九八四年所撰寫的「東歐研究之趨勢與現況」一文中即指出，「學術研究是經濟與貿易發展的重要基礎。日本經貿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乃是得力於學術界的配合。我國近年來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科學園區的建立，亦均有賴於學術的支援。」^⑤顯然地，這些年來，政府對學術的多元化研究，已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2. 在考察方面：至七十年代東歐國家對國人來說，仍極為陌生，一方面它是屬於共黨陣營，有關東歐資訊，在國內報導的甚為有限；另一方面政府也限制國人赴該地區旅遊或考察。因此，當我國經貿單位準備開放東歐市場之際，最傷透腦筋的是，相關資料極端短缺，在倉促的情況下，僅由外貿協會草草編印了東德、波蘭、捷克、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五本小冊子，其大部資料還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經貿單位和工商團體為了彌補國內資料的不足，不得不派專人或組團前往東歐國家進行實地考察，並藉著「面對面」的溝通管道，與當地的經貿官員接觸，才能深入瞭解東歐市場的結構與特性。一九八三年，外貿協會和台灣區進出口公會首度組團赴東歐考察。其後，赴東歐的「貿易訪問團」和參加在東歐舉辦的商展，日漸增多，形成氣候。

3. 在擬訂相關配合措施方面：政府為了配合開放東歐市場的政策，不得不把某些過時的法令規章予以修訂或廢除。其中最主要者，如放寬東歐國家的旅行和貿易管制。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經濟部貿易局擬訂「與東歐國家進出口貿易案件處理原則」，規定凡涉及東歐國家的直接進出口貿易，均由國貿局負責審批。該項原則對從東歐進口的貨品施加限制，以工業原料、機器和半成品為原則，出口貨品則不限類別。^⑥與此同時，經濟部國貿局為了國產品外銷，也擬訂了「推動國內廠商參加東歐地區商展獎勵辦法」，給予企業界更多的方便。

綜觀此一階段的特點，即國內廠商仍在開發摸索階段，即使政府允許與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五

表一：我國與東歐各國進出口貿易額比較

單位：千美元

進出口 貿易額 國別	時間	1983		1984		1985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阿爾巴尼亞		68	—	218	4	14	10
保加利亞		233	—	2,398	1,930	1,735	214
捷克斯洛伐克		110	3,954	287	5,746	1,810	2,873
東德		3,096	4,043	2,825	3,619	1,916	2,341
匈牙利		4,254	673	5,326	2,435	5,005	1,639
波蘭		11,617	4,496	5,188	6,246	6,416	3,035
羅馬尼亞		2,285	52	3,064	2	2,414	172
南斯拉夫		249	45	368	558	519	115
貿易總額		35,175		40,214		30,228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編印，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台北：民國八十年七月。

⑤ 洪茂雄，「東歐研究之趨勢與現況」，問題與研究月刊，第二十三卷第五期，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十日，頁一〇七。
⑥ 經濟日報，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第二版。

國進行直接貿易，但因礙於貿易方式的差異、通匯、商情資訊交通等因素，這六年當中，我國與東歐國家的貿易仍以間接為主，雙邊的貿易額相當有限，均維持在二千萬至四千萬美元之間（參見表一）。究其原因：其一，東歐國家的企業均屬國營，採計畫經濟，對外貿易以對等或以貨易貨為主，我國廠商尚無法適應。其二，東歐國家的外匯短缺，交易又耗費時日，缺乏效率，不符合經濟原則。其三，雙邊沒有實質關係基礎，欠缺溝通管道，加上資訊流通不便，很難掌握市場動態。其四，中共推動改革與開放政策，中國大陸的市場仍對東歐國家極具吸引力。此外，意識形態和交通運費的考慮，也多少影響雙邊經貿關係的發展。

（二）成長平穩階段（一九八六—一九八九年）：我國與東歐的經貿關係，經歷了六年時間，結合各方面的力量，努力開發，績效已漸顯露。最明顯的例證，即可從一九八六年以後，雙邊的貿易成長數據看得出來。一九八五年我國與東歐國家的貿易額只不過三千萬美元多一點點，到了一九八六年提升為一億二千餘萬美元（其中包括蘇聯約三千萬美元），一九八七年再升為二億六千餘萬美元（包括蘇聯七百五十九萬美元），至一九八八年則加倍成長，增加為四億一千餘萬美元（包括蘇聯三千四百餘萬美元）（參見表二、表三）。惟到了一九八九、一九九〇年，這二年雙邊的貿易額略有下降，只維持在二億五千萬元左右。⑦其主要原因乃係受到東歐全面「非共化」的影響，政權和平轉移，新的制度在重建中，經濟陷入困境，沒有多餘的外匯從事外貿活動。客觀的說，此一階段雙邊貿易額的平穩成長，除了廠商努力經營外，政府放寬貿易的限制，也起了積極作用。一九八七和八八年國貿易局兩度修訂「放寬對東歐國家貿易限制實施要點」，採較務實而彈性策略，平等互惠原則，予雙邊經貿人員和廠商更多的便利，而擴大了雙邊發展貿易的空間。

（三）擴大交流階段（一九九〇年以後）：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東歐國家令人意想不到地共黨政權紛紛垮台，全面走向「非共化」，使得政權順利和平轉移。無疑地，東歐民主化的新形勢，對我國擴大發展雙邊關係極為有利。自一九九〇年起我國與東歐國家之間交流的層面，已有明顯擴大的跡象。茲舉數例以為佐證：

1. 設立具有官方地位的代表機構：一九九〇年三月，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正式成立「台北商務辦事處」；一九九一年九月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首都布拉格設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⑧未來還準備在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國首府陸續成立類似機構。

2. 擴大交流領域：過去我國與東歐國家的交往，基本上限制在經貿層次方面，目前雙邊的交流已擴大到新聞、文化、藝術、體育、學術等方面，如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的音樂藝術團體來訪；東歐學者一九九〇年九月首次參加在台北舉行的

⑦ 財政部統計處編印，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民國八十年七月。

⑧ 自由時報，民國八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二版。

表二：我國與東歐各國出口貿易額比較

單位：千美元

進出口貿易額	1987年1~12月			1986年1~12月			增		減		比		較
	貿易總額	出口金額	進口金額	貿易總額	出口金額	進口金額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保加利亞	40,384	6,213	34,171	14,277	3,325	10,953	26,107	183	2,888	87	23,218	212	
捷克斯克	20,905	4,601	16,304	12,608	2,794	9,814	8,297	66	1,807	65	6,490	66	
東德	62,323	8,874	53,449	23,214	2,947	20,267	39,109	168	5,927	201	33,182	164	
匈牙利	28,008	19,904	8,104	14,154	10,857	3,296	13,854	98	9,047	83	4,808	146	
波蘭	62,987	20,466	42,521	17,871	9,645	8,226	45,115	252	10,821	61	34,295	417	
羅馬尼亞	10,115	3,422	6,693	3,430	1,177	2,253	6,685	195	2,245	191	4,440	197	
蘇聯	31,071	5,476	25,595	5,682	2,134	3,549	25,389	447	3,342	157	22,046	621	
總額	7,598	550	7,048	29,995	456	29,539	-22,397	-75	94	21	-22,491	-76	
	263,391	69,506	193,885	122,131	33,335	87,89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統計資料。

表三：我國與東歐各國進出口貿易額比較

單位：千美元

進出口貿易額	1988年1~12月			1987年1~12月			增		減		比		較
	貿易總額	出口金額	進口金額	貿易總額	出口金額	進口金額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保加利亞	24,781	7,239	17,542	40,384	6,213	34,171	-15,603	-38.6	1,026	16.5	-16,629	-48.7	
捷克斯克	38,825	5,877	32,948	20,905	4,601	16,304	17,920	85.7	1,276	27.7	16,644	332.1	
東德	100,751	11,578	89,173	62,323	8,874	53,449	38,428	61.7	2,704	30.5	35,724	66.8	
匈牙利	45,450	27,688	17,762	28,008	19,904	8,104	17,442	62.3	7,784	39.1	9,658	119.2	
波蘭	89,765	22,636	67,129	62,987	20,466	42,521	26,778	42.5	2,170	10.6	24,608	57.9	
羅馬尼亞	53,956	2,139	51,818	10,115	3,422	6,693	43,841	433.4	-1,283	-37.5	45,125	674.2	
蘇聯	25,991	5,726	20,265	31,071	5,476	25,595	-5,080	-16.3	250	4.6	-5,330	-20.8	
總額	34,408	3,526	30,883	7,598	550	7,048	26,829	354	2,976	542	23,835	338.2	
	413,927	86,409	327,520	263,391	69,506	193,885	150,555		16,903		133,63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統計資料。

第七屆「中歐學術研討會」。

3. 提升雙邊官方互訪層次：東歐「非共化」之後，政府官員、國會議員互訪漸趨頻繁，其中較引人注目者，如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夫人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應邀訪問台北^⑨；一九九一年五、六月間，我國經濟部政務次長江丙坤率團訪問匈、波、捷、保等國。

4. 加強經濟合作：爲了提升我國與東歐國家的實質關係，外交部除了在歐洲司成立「東歐小組」，以利業務推展外，經濟部已決定重擬「對東歐經貿工作方案」。該方案的重點擺在：第一，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將提供波蘭、捷克、匈牙利人員的技術訓練。第二，繼續推動與東歐國家簽署投資保障協定、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第三，中國輸出入銀行在維也納設立據點，與中央信託局設立的相對貿易帳戶，共同協助廠商開拓東歐市場。第四，輔導會研究選擇東歐國家籌建中國餐館，可與業者赴匈牙利藉設餐館、成立台灣貿易中心的構想結合。^⑩一九九一年九月，政府又決定，以「中國台北—歐洲合作基金」（Taipei China Europe Cooperation）的名稱出資一千萬美元，加入歐洲重建開發銀行特別基金。^⑪這將是我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組織共同運作，協助東歐國家建設的具體作爲。行政院長郝柏村在立法院八十八會期的施政報告中，重申今後我國的對外關係，仍以務實爲本，東歐國家列爲重點工作之一。^⑫相信九〇年代我國與東歐國家的互動關係會更有具體表現。

四、當前東歐國家的新形勢

作者何以那麼肯定，相信未來我國與東歐國家之間的關係會有更進一步的改善？其所持的主要論證是，東歐已展現新的面貌，共產黨土崩瓦解，諸多改善雙邊關係的障礙大大減低，正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向被視爲鐵幕國家的東歐集團，四十年來在紅色極權的恐怖統治下，自由的火花和民主的幼苗，屢遭踐踏，幾乎難有茁壯的機會。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有不少國家被赤化，而失去自由，但還沒有由共黨「一黨專政」轉化爲多黨民主的先例。可是，一九八〇年代最後半年，在東歐却出現一連串劃時代的變革，而使這些所謂「共黨國家」的原來面貌完全改觀。諸如：一九八九年九月，波蘭經由自由選舉而誕生了東歐第一個「非共」領導的政府；十月七日，匈牙利社

⑨ 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四日，第二版。

⑩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年九月十八日，第九版。

⑪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七日，第二版。

⑫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一、二版。

會主義工人黨宣布與馬列主義決裂，自行廢黨，改名「社會黨」，更推波助瀾，增強東歐「非共化」的勢頭；十一月九日，修建已達廿八年的「柏林圍牆」突然開放，非但導致東德共黨政權垮台，而且加速了東西德的統一進程；緊隨東德快速的變革，於十一月十日，保加利亞執政長達三十五年的保共領袖日夫可夫（Todor Zhivkov）也被迫下台；隨後，捷克斯洛伐克亦引發一場和平革命，捷共領導階層交出政權，平反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使得當年改革運動的領導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奇蹟式的復出，接掌國會議長，而國家元首改由著名異議分子哈維爾（Václav Havel）接任；同年十二月，最令人感到振奮的是，堅持史達林主義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政權，儘管控制森嚴，却是不堪一擊，僅僅在一個星期之內即被推翻。凡此種種，東歐這種革命性的變局，非但已在共黨世界產生一波又一波洶湧澎湃的衝擊，而且對戰後東西方形成的秩序結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⑬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東歐國家的政治變遷，歸納下列幾個表徵：

（一）修改憲法：戰後東歐國家，幾乎都抄襲史達林模式的憲法。過去四十年也曾經數度修改，但嚴格地說，共黨政權對憲法的態度，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自一九八九—一九〇年間，所有東歐國家均做了大幅度的修憲，並刪除保障共黨「領導地位」的條款，實行多黨民主，使共黨「一黨專政」的時代正式結束。

（二）更改國號：為了顯示獨立自主性，並落實民主化，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先後更改國名。匈、波、保三國把「人民共和國」刪掉「人民」（共黨一向堅持的「人民民主專政」概念），改稱「匈牙利共和國」、「波蘭共和國」、「保加利亞共和國」；羅馬尼亞則乾脆把齊奧塞斯庫時代所稱的「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改名「羅馬尼亞」；捷克則把其國號「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改為「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阿爾巴尼亞則把「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改為「阿爾巴尼亞共和國」；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國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亦宣布刪除「社會主義」的官方名稱。這顯示主宰東歐四十年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被拋入歷史的灰燼中。

（三）共產黨改頭換面：因為共黨聲名掃地，不再得到人民信任，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共黨尚未改名之外，其他共黨幾乎都更改名稱，藉此與過去的歷史劃清界線，刻意塑造新形象，以挽救危機。匈共改名「社會黨」，東德共黨改名「民主社會主義黨」，波共改名「社會民主黨」，保共更名為「社會黨」，南斯拉夫境內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共產主義者聯盟亦更名為「民主革新黨」，境內最大的塞爾維亞共和國，亦把官方的「共產主義者聯盟」和「社會主義聯盟」合併，更名為「社會黨」，即使長久堅持史達林主義的阿共，最終亦宣布更名為「社會黨」。改頭換面後的社會黨或社民黨，以及改組後的共黨，

⑬ 洪茂雄，東歐變貌，台北，時報文教基金會出版，民國八十年五月二十五日，頁九—一三。

均另訂新黨綱，放棄列寧式的「民主集中制」，與其他政黨公平競爭，由「革命政黨」轉換為「民主政黨」。

四、社會運動帶動了民主化：波蘭的「團結工會」、匈牙利的「民主論壇」、東德的「新論壇」、捷克的「公民論壇」、保加利亞的「生態公開」等，這些團體原是以社會運動為取向的組織，因能有效整合反對力量，終於迫使共黨放棄獨攬大權，而走向政治多元化。這些團體也就順水推舟，扮演了政黨的角色，有效地逼迫共黨和平地交出權力。

五、政經改革同時進行：其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的步伐更快，剛好與六、七十年代相反；當時東歐國家僅在經濟領域作不同程度的改革。目前經改方向由中央指令性計畫經濟逐漸轉向市場經濟。目前正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把土地交還給民，國營企業開放為股份有限公司。

六、黨政分離：黨的領導人不再兼任國家元首職務，並解散由黨控制的「民兵」或安全部隊，以及不再享有諸多如取得國庫補助、佔用公產、壟斷大眾傳播媒體特權。

此外，在東歐國家民主化進程上，還引人側目者，如共產黨權力結構的調整和黨員大量流失。東歐共黨為適應新形勢，領導核心以主席取代沿用四十年的總書記或第一書記，執委會取代政治局，並解散政府部門、軍隊及企業等工作單位之基層組織。再者，過去東歐各共黨黨員人數佔人口比例依次是：羅馬國百分之一六點四、東德百分之一三點七、捷克百分之一〇點六、保國百分之一〇點一、南國百分之九點五、匈國百分之八點二、波蘭百分之五點八、阿國百分之四點一。可是，隨著東歐民主化的腳步，共黨黨員脫黨人數相當可觀，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等國共黨黨員幾乎有三分之二以上退黨。^⑭導致東歐各共黨衰退的主因，可歸納下列四點因素：

其一，官僚體制僵化，已無法適應客觀環境的變化，尤其經濟發展受制於意識形態，既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競爭，又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民怨已深，自難獲得人民信賴。

其二，東歐各國民主化的激盪，致使「一黨專政」難以維繫，實行「多黨民主」，乃民心歸向。

其三，戈巴契夫的「改造」(Perestroika)和「公開性」(Glasnost)政策助長了東歐民主化的發展。

其四，東西歐的互動關係，加速了東歐民主化的腳步。西方國家提供資訊和經援，大大地削弱共黨的威權。

綜觀以上所述，東歐國家四十年來的政治變遷，最明顯的表徵，即戰後所形成的基本形勢，僅經過短短半年的民主化浪潮衝擊下，終於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例如政經體制，無論是結構性的，或是功能性的，等於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憲法不再是裝飾品，已能發揮規範功能；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議會，經由自由選舉產生，不再是如同過去共黨專政的橡皮圖章；運

⑭ 同註。⑬

作四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也由計畫經濟轉換為市場經濟，同時私有制已不再是禁區，可正正當當取得合法性。

從以上東歐劃時代的變革看來，作者有理由相信，九〇年代我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因為東歐展現新的面貌，提供了相當良好的條件：首先，就經濟條件而言，東歐各國正邁開腳步，全面走向市場經濟，這樣的發展當然比起以前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重重關卡和層層節制，更容易進行經貿交流。例如一九九一年五、六月間，經濟部政務次長江丙坤訪問東歐時，即深受禮遇和重視。這種現象在共黨當政時期，是不可能出現的。其次，就政治條件而言，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消聲匿跡，已影響不了政策之推行，取代共黨上台執政的大都是昔日被共黨迫害的異議份子，這些政治人物識時務，有正義感，比較容易打交道。一九九〇年二月二日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哈維爾上任不久，即無懼於中共當局的抗議，以歐美第一個國家元首身份接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¹⁵今（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一個來自波蘭的國會議員訪問團抵達北平後，直截了當地向中共當局要求釋放政治犯，尊重人權，遠比西方國家的政界領袖要高明得多。¹⁶這二件事情，都深受國際社會刮目相看，同時也幾乎替我們國人傳達了心聲，豈不令人感動。

五、結 論：展望九〇年代

綜合以上所述，我國與東歐國家的經貿關係，歷經十二年的經營，從無到有，總算有了突破和進展。從整個發展過程看來，政治意義似乎大於經濟意義。因為：其一，我國與東歐國家的貿易額一直呈現逆差，我國實際得到的經濟利益有限；其二，過去我國均以意識形態的眼光，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敵對國家」，壁壘分明，暫不往來。現在，我們終於打破這種敏感禁區，樂意與之交往，顯示我國的對外政策比以前靈活而有彈性，深具政治意義。

不過，展望九〇年代我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作者深以為，無論政治意義或經濟意義都有很寬廣的提升空間。作者所持的看法：

第一，東歐市場的潛力可觀，亟待繼續開發。如果把東歐七國的人口加上波羅的海三國和烏克蘭共和國在一起，約有二億人口左右，這一遼闊地區正由計畫經濟邁向市場經濟，其加強對外經貿關係的意願甚高。再者，八〇年代日本和中共對東歐國家的貿易額每年均有六十億美元上下，這也顯示這個市場仍有我國廠商競爭的空間。一九九一年一至七月的雙邊貿易總

¹⁵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二月四日，第一版。

¹⁶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 25, 1991, p. 11。

額已超過三億美元，①未來數年，增加十億或十五億美元，應該不算難事。

第二，蘇聯和東歐共黨的全面崩潰，中共愈形孤立，北平當局欲想影響東歐國家的對外關係談何容易，何況中共政權蔑視人權，迫害異己，更為當今東歐執政者所不齒。因此，我國加強與東歐國家的實質關係，基本上來自北平的阻力有限。最近，我國先後在布達佩斯和布拉格設立具有官方地位的代表處，即為明證。

第三，善用我國經濟實力，可以爭取很多的友誼。我國參與歐洲重建開發銀行，並運用海外經濟合作基金，協助東歐國家重建，雪中送炭自然容易建立友誼。

準此以觀，展望九〇年代我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應屬樂觀。

*

*

*